

文 史 哲 通 识 读 本 丛 书

廖祥忠 | 总主编

中国哲学史

通 识 读 本



李中华 ○ 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文 史 哲 通 识 读 本 丛 书

廖祥忠 | 总主编

中国哲学史

通 识 读 本

李中华 © 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北京 ·

总序

一、缘起

近年来,全国艺术类院校招生火爆,确实发现了不少好苗子。但大家也普遍感到很多学生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比较肤浅,缺少深刻的内涵,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生活阅历不够,没有积淀;二是文史哲的根基没有,或者很少;三是我们的教育也没有完全回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强调,大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弘扬优良传统,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鉴此,中国传媒大学决定先行先试,在全国启动艺术类招生考试改革。2019年艺考初试(文化素养基础测试),我们一改以前只考语数英的情况,新增文史哲,让考生二选一。当年有约10

万艺考生，竟然近一半选择了文史哲，出乎我们的预料，也在全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怎样才能更好地抓住文史哲艺考这个牛鼻子，切实提高广大艺术类考生的文化素养？我们决定实施通识教育发展三步走战略：一是五湖四海，聘请名师名家，打造一流的文史哲通识教材；二是组建通识教育中心，以阳明书院为依托，以融媒体为手段，用人文素养修身，引导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三是以落地、落实新文科建设为目标，逐步建立和完善大学本科教育的文史哲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模块。近期的任务，是对艺术类考试全面改革，从2020年起，艺术类考生必须通过文史哲的考试这一关。

二、问道

打造一流的文史哲通识教材谈何容易！为此，学校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确定了“双一流”目标：一流的作者，一流的质量。

作为一校之长，我深感责任重大。我把目光聚焦到了百年名校北京大学。2019年6月26日，我和出版社曾白凌、蔡开松等同志一起前往该校，专程拜访了文史哲方面的著名学者李中华先生、温儒敏先生、张帆先生，畅谈对新文科建设的设想，交流对文史哲通识教材的看法。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中华先生强调，文史哲通识教育不仅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学习，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熏陶和传承。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自己放进去，思考自己该怎么做。正如《论语》中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通识教材的文史哲内容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谈的概论上。现在讲国学，核心是要解决我们内在的思想、修为和精神，这是文史哲通识教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国家级教学名师温儒敏教授表示,中国传媒大学能够直接抓文史哲教材,考虑具体的事情,很难、也很难得,他积极支持。他认为考试是个指挥棒,这么多艺考生,如果中国传媒大学能带个头,带好这个头,寻找一种可行的模式,把基础教育、文化考试和思想教育、文化素养结合起来,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他认为一定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带领学生通读、精读传统文化和世界经典原著。要先开设课程,让学生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走向经典阅读的提高过程。通识教材要在“通”字上下功夫、做文章,要打破专业的局限和条条框框,使文史哲成为不同学科都能融会贯通的基础知识教育。优秀的文艺人才、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与世界接轨和同步,所以,文史哲不仅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也要有世界文化的精华。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育部“九五”规划教材《中国古代简史》作者张帆教授认为,通识教材要有大历史观。要在结构和体例上有创新和突破,以时间和朝代为主线,通过概论、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有机组成部分,使历史能够全景、重点、形象地展现出来。

教授们的讲话我非常认同,也深受感动。于是我趁热打铁,当场邀请在座的名师名家出山,为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站台助阵,为传媒人传道授业解惑。教授们欣然接受了邀请。

同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教授们如约前来,令人感动。尤其是李中华教授,凌晨四点从外地赶回北京,九点准时莅会,殊出意料;发完言,身体实在难以支撑,不得不提前离会,让我深感内疚。这也说明老先生对通识教育是多么重视!

会上,教授们再次就通识教育发表真知灼见。

李中华教授指出,老子讲“不出户知天下”,当今社会,传媒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传媒对人心的塑造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软性的力量,很难量化的力量。培养什么样的人来做传媒,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通识教育可以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传媒人尤其要重视人文素养的

养成与提升。我们愿意为学校的通识教育作出努力。

温儒敏教授指出,通识教育应该注重三点,一是注重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就是正常的人格教育;二是注重博雅教育,培养更高一点的优美情感,审美情趣;三是注重专业教育,但在专业教育的过程中不应该忘记通识教育,要让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水乳交融。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学生读书,比如挑选20种中外的、古典的最精要的书,让大家从中再挑选5种读,效果比请人做讲座好得多。

葛晓音教授在上一次拜访时因身体不适而未晤面,这次拨冗出席,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提出古代文学教育的三个层次:一是把握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提高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二是提高文学感悟能力,培养健康纯正的审美趣味。三是以前代文学的精华滋养心灵,提升精神境界,培养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

张帆教授从当前历史学科教育出发,指出通识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多线条地而不是单线条地看到历史,也可以培养学生养成读史的习惯,提高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

会上,四位教授言我所未言,见我所未见,面聆馨欸,如沐春风,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大家风范。如何搞好通识教育,尤其是如何做好通识教育基础性工程的建设,打造能经得起各方检验的文史哲通识教材,我的脑海里慢慢有了清晰的思路。

三、布局

在多方征求意见后,我们确定了丛书名:“文史哲通识读本丛书”,拟在2020年10月之前出齐《中国历史通识读本》《中国哲学史通识读本》《中国古代文学通识读本》《中国现代文学通识读本》这四本书。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确定了如下撰稿原则:一是坚持立德树人的原

则,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二是书稿内容要求全面、系统、权威。“全面”是指知识构架不要有大的缺失,重要内容不要有大的遗漏。“系统”是指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权威”是指材料的认可度高,所举案例,要么是经典性案例,要么是有典型意义的、有说服力的最新案例;并且,观点必须是权威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不成熟的观点,或者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不宜收入。三是这套书不是研究性著作,而是通识读本,所以,行文要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少用生僻的字词句,不用过于哲理化的弯弯绕的文字:要尽量使用陈述句,用字简省,表意准确,叙述概念、原理时尤应如此,以便学生爱读易记。四是应突出新文科的特点。“新文科”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指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科学技术融入哲学、历史、文学等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四、希望

在2020年3月12日举行的全国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视频会议上,我向全国高校介绍了我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改革举措及经验,得到教育部翁铁慧副部长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既是对我校大力推进艺考改革、取得成效的充分认可,也是对我校勇于担当、敢于实践探索的极大鼓励,令人振奋!

艺术生是文化建设的新生力量,战略储备,艺术生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的创作水平,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会影响我们的未来。艺考的导向有问题,教材、参考书不好,会误大事、出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文史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根脉所系,灵魂所附,内容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历史的淬炼,才得以一代一代传下来。作为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副组长,我要站在新文科建设的高度,为提

升艺考生的文化素养而努力。我们甚至设想,艺考时要考文史哲,艺考生招进来后,一二年级还要系统地学习文史哲的基础知识,并加大对原著的阅读,回望所来的未知,汲取往圣的智慧,为同学们将来的发展培元固本,强基铸魂。为此,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为有力、有恒、有制地进行通识教育做了机构性设置。不仅如此,在我校涉及招生、培养、学位、质量监控、学科专业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教育综合改革中,我们在不少专业的招生中也更注意对文史哲的知识理解,对通识的贯通性认识。而且,我们特别重视对写作能力的考察,在培养环节中增加了相应课程,供大家选择。总之,我希望同学们真正学好这些课程,切实提高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出口成诵,下笔成章,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学以益智,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以修身。”让包含“忠诚、自信、包容、竞先”文化基因的新中传精神广泛传播,嵌入中传人的精神家园。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每一个不曾阅读的日子,都是对大学的辜负”。

古人说,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我们先推出四种,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出《世界历史通识读本》《西方哲学史通识读本》《西方文学通识读本》等通识教材,让学子们既守故垒,兼通中西。

想法虽好,然孜孜汲汲,如琢如磨,奉献在您面前的这套教材成色如何,能否契合初心,说实话,我们没有把握,可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书中如有不妥及错讹处,希望您不吝赐教,我们一定俯身倾听,及时修正,使这套通识教材日臻完善。

是为序。

廖祥忠

〔廖祥忠,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副组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	导 言
	第一编 先秦哲学
37	第 一 章 中国哲学的起源
44	第 二 章 孔子的哲学
52	第 三 章 老子的哲学
60	第 四 章 墨子与墨家
69	第 五 章 孟子的哲学
77	第 六 章 《易传》的哲学
87	第 七 章 庄子的哲学
96	第 八 章 惠施与公孙龙
105	第 九 章 荀子的哲学
114	第 十 章 韩非子的哲学
	第二编 汉至唐代的哲学
125	第十一章 汉初的哲学思想
133	第十二章 董仲舒的哲学
142	第十三章 扬雄和王充
150	第十四章 何晏和王弼
157	第十五章 阮籍和嵇康
165	第十六章 裴頠和郭象
173	第十七章 汉至隋唐的佛教哲学
188	第十八章 汉至隋唐的道教哲学
199	第十九章 韩愈和李翱
206	第二十章 柳宗元和刘禹锡

第三编 宋至清代的哲学

- 215 第二十一章 周敦颐和张载
226 第二十二章 程颢和程颐
237 第二十三章 朱熹的哲学
249 第二十四章 陆九渊的哲学
259 第二十五章 陈亮和叶适
267 第二十六章 王守仁的哲学
278 第二十七章 李贽的哲学
285 第二十八章 黄宗羲和方以智
296 第二十九章 王夫之的哲学
306 第三十章 颜元的哲学
313 第三十一章 戴震的哲学

第四编 近代哲学

- 323 第三十二章 龚自珍和魏源
334 第三十三章 康有为的哲学
345 第三十四章 谭嗣同的哲学
353 第三十五章 梁启超的哲学
363 第三十六章 严复的哲学
371 第三十七章 章太炎的哲学
381 第三十八章 孙中山的哲学

390 后 记

导 言

有哲学,才有哲学史。而“哲学”是一个译名,其西文原字出于古希腊,本是“爱智”的意思。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但汉语“哲”字,却早在周代的钟鼎铭文中即已出现。据《说文》《尔雅》及古文献对其解释,“哲”字亦为“智慧”的意思。但后来哲学家们对“哲学”的界说甚多。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或简要地概括为“哲学就是认识论”。

既然哲学的本质是认识,那么哲学史就是人类的认识史。哲学史研究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认识,构成宇宙论或自然观;对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认识,构成社会历史观;对人生发展的认识,构成人生论,其中包括伦理学、心性论、人性论、修养论等;对思维规律的认识,构成知识论,其中包括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等。这就是说,哲学研究的内容,也是哲学史研究的内容,其区别仅在于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内容”是纵向的、历史的和连续的。

因此,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它以逻辑的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经历,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哲学智慧。

—

先秦哲学,顾名思义,即是在秦以前发生的哲学。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这是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历史时期。其下限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其上限有较大的伸缩性。对此,学术界有两

种说法：一是以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为起点，故其上限可定于夏代（公元前 21 世纪）；二是以文字的发明为起点，其上限可定于商代（公元前 16 世纪）。实际上，在对中国哲学思想起源问题的研究上，上述两项起点不能绝对化，因为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不是突然的爆发，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思想的产生要早于文字的产生。

先秦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的起点，往往需要从其萌芽阶段说起，故其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夏，甚至比夏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就此，我们可以把先秦哲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酝酿期、产生与繁荣期。

（一）萌芽期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按照马克思“哲学最初是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的说法，中国早期原始宗教中的自然神崇拜和灵魂不灭等观念，即是最原始的哲学唯心论的萌芽。而中国古代流传的“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盘古开天”“刑天”“混沌”等神话和传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人类对周围环境和自然界的虚幻理解及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上古人类思维发展的原始状况，这些都具有哲学萌芽的性质。中国早期人类正是在意识的宗教形式和神话幻想中经历了史前期哲学萌芽产生的历史进程。

当历史进入奴隶制社会，史前期的原始宗教和神话幻想所蕴含的思维萌芽并未结束，它随着历史发展进入了一种新的形态，即由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逐渐发展为一神崇拜。这标志着原始宗教观念由自发阶段转入自为阶段，从而获得了社会属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众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神身上。据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夏代呈现的是多鬼多神的崇拜，而殷代则出现了祖先神——“帝”或“上帝”的一神崇拜。这里的“一神”多指统一神或至上神。

周王朝的建立，似乎进行了古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其表现是把殷人的上帝崇拜发展为对“天”的崇拜。实际上，“天”和“天命”的概念，早在殷商时即已存在，但与“帝”或“上帝”的概念相比，“天”和“天命”并不占主流地位。周人抛弃了至上神“帝”或“上帝”与殷人的血缘属性，把“帝令”换成“天命”，把具有精神意志和人格化的“天”进一步抽象化，以此作为天地万物和天下

万民的最高主宰,并以有神论的天命论,大力鼓吹“福善祸淫”和“君权神授”。

与殷人的上帝崇拜相比,周人崇拜的“天”或“天命”,无疑获得了作为天地万物最后根源的主宰者的普遍性地位。这是一种思维能力的提升,也可构成寻找世界统一性的思维萌芽。

此外,能够作为西周初期中国哲学萌芽的两部文献值得我们注意:一部是《尚书·洪范》篇中所提出的五行观念;一部是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古经。五行观念中对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性质的认识,以及《易经》中的八卦、六十四卦卦名及其含义,都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萌芽性质。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卦爻辞所反映的思想,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小往大来”“大往小来”,等等,也都具备了哲学命题的性质并有物极必反的思维萌芽。

(二) 酝酿期

公元前 770 年,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此即后世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同时也是思想上新旧交替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76 年近三百年的思想发展视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的第一阶段——先秦哲学正式产生前的酝酿期。其内容和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由宗教神学的天道观向自然天道观的转变。春秋以前还没有出现“天道”概念,但却实有其内容,只是这些内容都包含在宗教神学的天命观念中。天命神学认为,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的出现及其变化,都是天神意志的体现,并由此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故天命内涵的主要指向,具有人格性、主宰性和神圣性以及天神所具有的根源性和必然性。随着西周末年王权的失落,作为周王朝最高意识形态的宗教神学的天命观也随之动摇。于是原有的专司观察天道的“瞽”和“史”,对天道的理解和认识也随之发生转变,即逐渐排除了“天”和“天命”的人格神含义。尽管这种转变还不够彻底,但终究出现了“天道”与“天命”相分离的思维意识,使对天道的研究走向对自然现象自身运动变化规律的了解和探寻。这已经是在运用一定的理性

思维排除天道范畴中的宗教神学内容,意味着哲学的大门已经开启。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周内史叔兴、郑国大夫子产和越国大夫范蠡等。

第二是对早期阴阳五行观念的发展。“阴阳”观念是在观察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的变化和时节递嬗、迁移基础上产生的。早在殷周时期,人们就已经知道一年四季的轮转、风霜雨雪的降临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与太阳的光照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轻清的气向上升腾形成天,重浊的气向下降落形成地。《周易》古经以《乾》《坤》两卦分别代表天和地,即是阴阳的象征。在现存《易经》的卦爻辞中,虽然还没有形成阴阳对称的概念,但其八卦的符号,却明显地蕴含着阴阳的原始形象,如“☰”象天,“☷”象地,其中的阴阳两爻分别以“--”和“—”为代表,在后来的文字表述中,这即是《周易》符号系统中的两个最基本要素,是构成中国文化中阴阳思想的源头。据《国语·周语》载,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关中地区发生地震,周朝史官伯阳父用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原理解释地震的发生,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种解释排除了天神预设的说法,与上述的自然天道观相呼应,企图从自然界自身的变动中寻找自然现象变化的原因,已具备了哲学理性思维的能力。

与阴阳观念相联系的是“五行”说。《尚书·洪范》最早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国语·郑语》记录了史官史伯的话:“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些材料说明,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把这五种物质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并以此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这些说法已经是典型的哲学思维,与五行观念和阴阳说一起,构成后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核心范畴和重要思想基础。对阴阳五行思想作出发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朝史官伯阳父、周太史史伯、内史叔兴、秦国名医医和、晋太史史墨、齐国大夫晏婴等。

第三是对人神关系的新界说。对人神关系的讨论,是春秋时期人文思潮兴起的重要表现,也是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它构成了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主题。仅就《左传》所记,人神之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经济事实出发说明鬼神与人事的关系,主张“先民后神”。《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载,隋国大夫季梁在与隋君讨论国政时提出:“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种“先民后神”的思想，明确表现了对人力和民力的重视。用“民者神之主”来概括人与神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一概括已具备了哲学命题的性质。又据《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虢国大夫史嚚在讨论国家兴亡时提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的命题。这一思想表面上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但认为鬼神对国家兴亡不起什么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事和君主的道德，并把对待鬼神的态度提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其“神依人而行”的概括也同样具有哲学命题的意义。

从自然现象的变化与人事关系方面解释人的吉凶，并提出“吉凶由人”的命题。《左传》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64年）载，这一年自然界发生了一些奇特现象：“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天降陨石，水鸟倒飞，国人惊恐，以为是天神降下祸殃。宋君向大夫叔兴讨教，叔兴回答：“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认为自然现象与人的吉凶都与鬼神无关。叔兴的说法阐发了伯阳父的阴阳二气说，同时扬弃了“天人感应”思想，得出“吉凶由人”的哲学命题。

从反对“人祭”和“焚巫”角度，主张“重人轻神”。《左传》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载，宋国大夫司马子鱼，反对宋公把抓来的郟国国君杀死，以作为地方社神的祭品。他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他认为祭祀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人，而人又是神所依赖的，因此，“杀人以祭神”与“祭神以为人”互相矛盾，所以杀人祭神是绝不可取的，因为这颠倒了人和神的主次关系。又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载，鲁国大夫臧文仲反对鲁国国君欲杀巫尪（鼻孔向上的畸形女巫）以解除旱灾的办法。认为只要努力搞好生产，国家就会富足，根本不必求神问天，表现出清醒的理论思考和哲学意识。

第四是道德规范新探索。春秋时期，不仅天人观、天道观、人神观这些属于自然观方面的思想有了长足发展，而且在伦理观和行为规范方面也有新的建树，为稍后儒家道德哲学的确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其中，在伦理规范和各种道德条目概念的内涵确定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论述，下面仅举一例以为代表。据《国语·周语》载，晋悼公即位前的言谈举止和品德风貌：

“夫敬，文之恭也；忠，文元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辨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这里，《国语》的作者提出了恭、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等十一条当时所推崇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条目，并分别概括了这些道德条目或概念的具体内容和意义。

《国语》一书，虽然成书于战国初期，但所依据的材料，多是春秋时代各国史官的原始记录。晋悼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58年，据此可以推断，上述道德条目和伦理规范，早在孔子以前即已提出，并且已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系统性，成为后来儒家道德哲学产生的文献基础和思想前提。

(三)产生与繁荣期

当历史进入春秋末期，中国产生了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老子和孔子。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其代表作品是《道德经》。孔子是中国第一位道德哲学家，其代表作品是死后由其弟子编定的《论语》。

老子比古希腊的哲学之父，也是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所处年代略晚；孔子与号称古希腊大哲的苏格拉底同时或稍早。但泰勒斯与老子、苏格拉底与孔子两相对比的最大差异是：泰勒斯和苏格拉底并没有为后世留下任何哲学著作，而老子和孔子却为我们留下了《道德经》和《论语》这两部作为中国哲学产生重要标志的著作及思想，并从其产生时起，一直到今天，它们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而未发生断裂。

因此，可以说，《道德经》和《论语》这两部著作及其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代表了中国人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对中国三代文明进行反思的理性思考。《道德经》不言天命，以“道”取代了上帝；《论语》虽言天命，却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扬弃和抽离了“天命”原有的人格神的内涵，并以仁、礼等价值理性淡化了殷周以来鬼神上帝的绝对权威。故《道德经》和《论语》这两部重要文献的出现，不仅成为中国哲学正式产生的主要标志，而